

中国大城市新移民的地方认同与融入^{*}

STUDY ON PLACE IDENTITY OF NEW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赵向光 李志刚

ZHAO Xiangguang; LI Zhigang

22

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3年 第37卷 第12期 VOL. 37 NO.12 DEC. 2013

【摘要】随着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大量新移民正成为城市常住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群体的社会融合与地方认同问题备受关注。依据塞缪尔·亨廷顿对地方认同的界定，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广州、杭州、成都、沈阳、东莞、郑州6市的316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对中国大城市新移民的地方认同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城市新移民正日益分化为劳力型、智力型和投资型移民3类，三大群体的地方认同存在较大差异。就认同机制而言，在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属性、制度、住房状况4个测量模型中，年龄、家庭生命周期、移民类型、月收入、户籍、社保状况、住房设施、住房类型等因素对地方认同的影响明显。结构模型分析表明，制度因素、住房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对新移民地方认同的直接效应依次递减，而个人特征通过社会经济因素对地方认同产生间接效应。总体而言，虽经多年市场化改革，制度因素仍是影响新移民地方认同乃至城市融入的最重要因素；住房状况对其地方认同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强。

【关键词】新移民；地方认同；结构方程模型；中国

ABSTRACT: China has been experiencing a rapid urbanization, together with a huge wave of migrant population. The migration in China now enters a new period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ition. The social inclusion and place identity

(PI) of new migrants have become a focus of both academic and public concerns. With a survey on 3,164 copies of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from six large Chinese cities of Guangzhou, Hangzhou, Chengdu, Shenyang, Dongguan and Zhengzhou, based on Samuel Huntington's definition of PI, this paper builds a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SEM) to examine the feature of PI and its related mechanisms for new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new migran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groups: labor migrants, intellectual migrants and investor migrants. The PIs of different groups are found to be different. In the measurement models, the age, family life cycle, type of migrants, monthly incom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ocial security status, housing facilities, housing type, etc. are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s. The SEM mode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institutional factors, housing factors,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have direct effects on the PI, whil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have an indirect effect on the PI. The impacts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housing factors,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PI decrease in sequence. In summary, after three decades of marketization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such as Hukou still have strong impacts upon the life of migrants, while the impacts of housing factor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KEYWORDS: new migrants; place identity;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China

1 引言

随着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大量新移民正成为城市常住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流动”群体正面临巨大变革与代际转换^[1]，典

【文章编号】1002-1329
(2013)12-0022-08

【中图分类号】C912.81;TU98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赵向光(1987-),男,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志刚(1976-),男,博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副系主任,教授,本文通讯作者。

【修改日期】2013-11-25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271163, 4113074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2013370003161413);ESRC/DFID 资助项目(RES-167-25-044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84001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28, 07JZD0025);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型如农民工、“蚁族”、“鼠族”等。新移民不仅经历地理空间转移,更面临着社会空间、文化场域及生活环境的巨大变迁^[2],面临地方归属与认同的重新建构^[3],也即社会认同重构。泰弗尔(Tajfel)指出,社会认同指个体归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归属感,涉及个体作为某个群体成员感受到的情感和价值^[4],通过自己所从属、所依赖的群体来定义自己。劳伦斯(Laurence)和贝里(Berry)则认为,社会认同包括这样一些关系:家庭纽带、个人社交圈、同业团体成员资格、阶层忠诚、社会地位等^[5]。普罗桑斯基(Proshansky)认为地方认同是自我的一部分,是通过人们有意识和无意识中存在的想法、信念、偏好、情感、价值观、目标、行为趋势以及技能的复杂交互作用,所确定的与物理环境有关的个人认同^[6]。帕西(Passi)指出,地方认同是群体与固定地区之间关系的自我认同,是对地域成为制度化过程的一种解释^[7]。

总体上,西方学者在移民社会认同方面已经积累了诸多经验,其文献主要集中在移民的文化性身份和归属性身份转变方面^[8],也即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方面。具体而言,在移民文化认同和融入方面,有“熔炉论”和“多元论”两种观点。“熔炉论”指出,移民在初到异地时往往依赖于自身族裔的移民聚居区,同时努力向主流社会融入;“多元论”则认为,少数族裔的移民社区是主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社会、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有其特殊贡献^[9]。类似研究表明,社会认同具有多个维度,仅考虑其中某一种维度的认同是不够的,对社会认同概念的扩展是其发展方向之一^[10]。例如,塞缪尔·亨廷顿对社会认同的维度和类别进行划分,将人们的社会身份/特性分为归属性的(如年龄、性别、血缘关系、人种属性等)、文化性的(如民族、部落、国籍、宗教、文明等)、地方性的(如街区、村庄、国别等)、政治性的(如集团、派别、党派、国家等)、经济性的(如职务、产业、阶级等)和社会性的(如俱乐部、休闲团体、社会地位等)6类^[11],进而为社会认同研究提供了一种界定准则。不过,西方的移民认同研究多聚焦国际移民,对国内移民的认同问题较少涉及;研究多围绕族裔维度展开,而对经济和制度(如国家)维度的研究不够深入。

国内对移民的社会认同及地方认同的大规模系统研究尚不多见,在相关的城乡移民(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城市适应、城市定居意愿等方面进行了部分探索^[12~14]。张文宏等^[8]将社会认同界定为群体认同、文化认同、地方认同、职业认同、地位认同和政治认同6种进行研究,发现各维度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倾向同时存在。

类似研究表明,经济、社会、心理是农民工城市适应的3个层次,随时间推进而依次推进^[15];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16];不同农民工群体在社会融合、定居意愿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7,18],如高收入群体和高教育程度群体具有更强的定居意愿^[19];地方认同与居住满意度、社会融合等因素的关系紧密^[20,21],等等。不过,目前研究多聚焦于个案城市,比较性的、包含多案例地的实证尚不多见;此外,对于不同代际移民的差别(如新老移民)的分析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将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2009年完成的广州、杭州、成都、沈阳、东莞、郑州6市3164份大规模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大城市新移民的地方认同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2 研究设计与调研方法

为获取中国典型大城市的新移民样本数据,课题组于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在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组织问卷调查。案例城市选取的考虑因素有:广州、东莞是南中国的代表性城市,杭州、沈阳是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典型城市,而郑州和成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部和西部城市。样本城市的选择包含对于问卷调查现实条件的考虑。调研问卷共设计问题82道,分为居住、工作和身份认同等7个方面。研究假设“新移民”可分为3类:智力型新移民、劳力型新移民和投资型新移民,其中智力型新移民指的是受过高等教育(大专以上,硕士以下),主要调查了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当地工作2~5年的群体;劳力型新移民指的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大专学历以下),在工厂、商场、餐馆等打工的农民工,这一群体也是新移民主体;投资型新移民则是拥有投资或产业,如小企业、小作坊、商铺、饭馆等的新移民。调查过程采取滚雪球方法,通过熟人寻找调查对象,每个熟人最多推荐3个人作为下一步调查对象,依次滚动,同时强调避免调查对象过于相似^[18]。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劳力型新移民主要调查制造业、服务业及其他行业的农民工;智力型新移民主要调查新近就业的大学生,尤其是居住在城中村、租/借

表1 分城市分类别的新移民样本分布
Tab.1 Sampling of new migrants in six large Chinese cities

项目	广州	东莞	沈阳	成都	杭州	郑州	合计
劳力型移民	277	263	202	216	123	236	1317
智力型移民	115	162	175	174	205	152	983
投资型移民	146	155	149	161	123	130	864
合计	538	580	526	551	451	518	3164

表2 城市新移民的基本情况
 Tab.2 Profiles of the samples

项目			劳力型 移民	智力型 移民	投资型 移民	全体新 移民
个人特征因素	性别 (%)	男	48.6	49.2	53.2	50.1
		女	51.4	50.8	46.8	49.9
	年龄 (岁)	均值	27	26	32	28
		标准差	8.55	3.67	7.96	7.51
	家庭生命周期 (%)	未婚	60.2	80.1	30.4	58.2
		已婚(含离异、丧偶)	6.4	10.7	10.8	8.9
		育有子女(未上学)	12.4	5.1	20.3	12.3
		育有子女(已上学)	21.0	4.2	38.5	20.6
	来本城市时间 (%)	3年以下	29.1	35.4	18.6	28.2
		3至4年	27.9	29.9	22.4	27.0
		4至5年	19.1	16.6	22.1	19.1
		5年以上	23.9	18.1	36.9	25.7
社会经济因素	教育水平 (%)	小学及以下	7.9	0.0	7.3	5.3
		初中	40.0	0.3	34.5	26.2
		高中(含中专)	49.8	1.2	34.7	30.7
		大专	1.7	47.7	14.7	19.6
		本科及以上	0.6	50.8	8.8	18.4
	职业 (%)	一般职员/一般打工	34.0	24.5	36.2	31.7
		个体户	17.7	35.2	15.5	22.5
		营业员/售货员/业务员	13.8	9.5	10.0	11.4
		技术人员	6.8	3.0	5.3	5.2
		一般管理者	5.3	2.8	3.7	4.1
		教师、文秘、财务、医务人员、律师	8.9	4.7	8.3	7.5
		保安、保洁、服务员、理发师、厨师、司机、家庭主妇	6.3	11.5	9.6	8.8
		无业或其他	7.2	8.8	11.4	8.8
	月收入 (%)	1000元以下	23.8	8.1	8.1	14.6
		1001-2000元	61.9	42.9	30.9	47.6
		2001-3000元	11.7	24.0	22.0	18.3
		3001-4000元	1.6	13.4	14.9	8.9
		4000元以上	1.0	11.6	24.1	10.6
	工作稳定性 (%)	经常变动	9.5	6.2	5.9	7.5
		偶尔变动	28.5	28.5	15.7	25.0
		较少变动	34.5	35.4	37.4	35.6
		稳定	27.5	29.9	41.0	31.9
制度因素	户籍 (%)	非本市户籍	96.7	73.2	91.7	88.1
		本市户籍	3.3	26.8	8.3	11.9
	社保指数	均值	1.34	2.81	1.01	1.70
		标准差	1.46	1.83	1.27	1.71
住房因素	住房类型 (%)	自购房	6.1	13.5	17.2	11.4
		租房	57.6	64.8	77.3	65.2
		单位宿舍或借住	34.5	21.5	4.2	22.2
		其他	1.8	0.2	1.3	1.2
	人均住房面积 (m ²)	均值	16.26	24.87	22.71	20.69
		标准差	14.04	17.86	18.60	17.03
	设施指数	均值	11.41	14.92	16.49	13.89
		标准差	6.22	6.27	7.60	6.99

小区房、单位宿舍的；投资型新移民的主要调查对象为小业主，分布在专业市场、制造业、服务业及其他专业市场。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164份，其样本分布如表1所示。问卷数据采用SPSS处理，总计录得755项指标。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作为主要定量分析方法，近年该方法在土地价格影响因素^[22]、城市旅游满意度及形象认知^[23]、居民出行行为^[24]、职住关系^[25]等方面均有运用，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因其在潜变量分析和路径分析方面的优势，SEM开创了崭新的量化研究范式^[26]，被称为近年应用统计学的三大进展之一，该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多元统计分析技术，整合了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方法^[27]。结构方程模型中既可以包含直接可以测得的测量变量，也可以包含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变量，测度测量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为测量模型，测度潜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为结构模型^[28, 29]，而对于社会学意味明显的社会认同和地方认同，均为不可直接测量的变量，因此引入结构方程模型是对其机制进行分析的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30]。本文采用AMOS 17.0软件进行模型构建、参数估计、模型修正等环节，从而完成模型实现。

3 实证分析

3.1 新移民基本情况与地方认同状况的统计分析

基于调查所得3164份问卷的数据，从个人特征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住房因素等4个方面对新移民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表2)。

在个人特征因素方面：就性别而言，无论是全体新移民还是每类新移民，其男女比例都接近1:1，样本的性别分布较为平均。此外，全体新移民的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58.2%的新移民还处于未婚阶段，55.2%的新移民来到本城市的时间低于4年，从侧面印证了流动人口的代际转换，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新生代正逐渐成为主力^[31]。

从不同类型新移民的对比来看，在年龄、家庭生命周期、来本城市时间方面，都呈现出“投资型移民 > 劳力型移

民>智力型移民”的趋势。投资型移民的平均年龄最大,其次为劳力型移民,智力型移民平均年龄最小;69.6%的投资型移民已经结婚甚至育有子女,而劳力型和智力型移民的这一比例仅为39.8%和19.9%;投资型移民中有36.9%的人来本城市的时间已超过5年,而劳力型和智力型移民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3.9%和18.1%,与投资型移民差距较大,说明投资型移民进行资本积累的时间较长,可能导致投资型移民一定的经济资本优势。

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就教育水平而言,98.5%的智力型移民具有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而投资型和劳力型移民的同等学历样本比例仅为23.5%和2.3%,智力型移民的教育水平远高于其他两类移民,为其创造了一定的文化资本优势。就月收入而言,投资型移民的收入水平较其他两类移民要高,在月收入达3000元以上的样本比例方面表现明显,有经济资本优势。在工作稳定性方面,投资型移民的工作稳定性高于智力型移民,智力型移民又高于劳力型移民。与教育水平、月收入、工作稳定性方面出现的类际差异不同,在职业方面,3类新移民则具有一致性,大多数新移民的就业集中在一般职员/一般打工、个体户、营业员/售货员/业务员3类,从事技术、管理、专业职业的较少,说明新移民的总职业状况还处于边缘地位。

在制度因素方面,绝大多数新移民都是外地户籍,但智力型移民中有26.8%的样本获得本市户籍,高于投资型移民(8.3%)或劳力型移民(3.3%),说明文化资本有助于新移民突破户籍壁垒。在社会保障方面,通过社保指数统计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拥有种类数,最大值为6,最小值为1,全体新移民的社保指数为1.70,说明新移民整体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此外,智力型移民的社保指数高于其他两类新移民。就住房类型而言,大多数新移民(65.2%)通过租房解决居住问题,但不同类别移民之间的住房类型有所差异,投资型移民自购房的比例为17.2%,高于智力型移民的13.5%以及劳力型移民的6.1%。全体新移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为20.69m²,其中智力型移民的人均居住面积最大(24.87m²),高于投资型移民的22.71m²和劳力型移民的16.26m²。在设施方面,研究选取自来水、电、煤气、手机、电脑、私家车等共22项设施,计算每个样本的设施指数,得到投资型移民的设施指数为16.49,高于智力型移民(14.92)和劳力型移民(11.41),可见投资型移民的住房设施的齐全性和舒适性最高。

就地方认同而言,采用亨廷顿对社会认同

的界定和分类方法,对其中地方性的社会身份/特性进行测度,即测度其地方认同。同时,借鉴张文宏等^[8]的研究方法,采用“定居意愿”、“购房意愿”和“子女预期”3个间接测量指标来进行测度,具体而言对应于“是否愿意在本城市定居”、“是否愿意在本城市购房”和“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在本城市发展”等3个问题的回答,这3个问题一方面可以反映样本在未来空间归属方面的意愿,一方面也可反映样本扎根城市、真正融入城市的意愿(表3)。

首先,全体新移民中58.8%的人愿意或者非常愿意在本城市定居,但各类别之间却存在差异,智力型移民中仅有12.7%的人表示不愿意在本城市定居,而投资型移民和劳力型移民的这一比例却达到17.9%和23.7%。从购房意愿来看,大约10.1%的新移民不愿意在本城市购房,劳力型移民的这一比例最高,投资型移民其次,智力型移民最低,与定居意愿反映的趋势一致。而从子女预期来看,54.9%的新移民愿意或非常愿意让子女在本城市发展,其中投资型移民表现最为突出,这一比例达到65.4%,高于劳力型移民和智力型移民。值得注意的是,智力型移民这一比例较低,反映该类移民对未来设想较为理性;超过10%的智力型移民对子女的未来发展地不确定,他们可能更加重视子女的选择而非自己对某城市的认同,不能简单地由该项统计得出智力型移民的地方认同较其他两类低的结论。

综上,城市新移民已经成为一个日趋分化的复合群体,3类新移民在个人特征因素、社会

表3 城市新移民的地方认同状况
Tab.3 Place identity of the samples

项目		劳力型移民	智力型移民	投资型移民	全体新移民
定居意愿 (%)	不确定	4.1	1.7	3.2	3.1
	非常不愿意	3.6	2.8	2.7	3.1
	不愿意	20.1	9.9	15.2	15.5
	一般	20.0	22.9	14.5	19.5
	愿意	43.8	51.7	55.5	49.5
	非常愿意	8.4	11.0	8.9	9.3
购房意愿 (%)	不确定	9.7	4.0	7.2	7.2
	不愿意	12.4	7.2	9.8	10.1
	愿意但能力有限	23.1	11.6	16.7	17.8
	愿意	54.8	77.2	66.3	64.9
子女预期 (%)	不确定	8.7	10.4	8.0	9.1
	非常不愿意	2.8	3.7	2.8	3.1
	不愿意	13.5	16.0	10.5	13.5
	一般	18.0	26.7	13.3	19.4
	愿意	44.8	33.4	51.4	43.0
	非常愿意	12.2	9.8	14.0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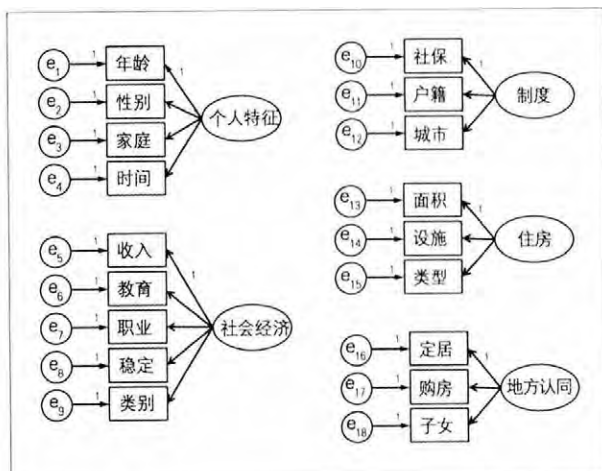


图1 测量模型构建
Fig.1 Structure of the SEM mod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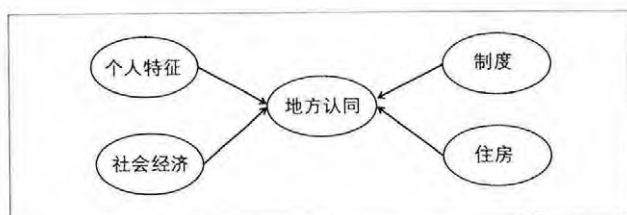


图2 假设模型构建
Fig.2 Hypothesis of the SEM model

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住房因素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而其地方认同状况也不甚相同，从定居意愿和购房意愿来看，智力型移民的地方认同最高，投资型移民其次，劳力型移民最低，而从子女预期来看，投资型移民最愿意让子女在当前城市发展，这种意愿高于劳力型移民和智力型移民。

3.2 新移民地方认同状况的影响机制分析 3.2.1 模型构建与变量处理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移民地方认同状况的影响机制，探讨哪些因素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方认同，以及影响的程度。为全面反映新移民基本情况和地方认同状况，将个人特征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住房因素、地方认同等潜变量和相应的测量变量纳入到模型中，构成5个测量模型(图1)，继而由潜变量构建结构模型。

对5个测量模型的说明以及相应的变量处理情况如表4。前文表明，不同类别新移民的地方认同状况有所不同，因此在社会经济因素这一测量模型中引入“移民类别”变量。此外，由于样本来自于6个不同城市，在制度因素测量模型中，引入“城市差异”这一变量，以检验城市差

表4 测量模型变量说明
Tab.4 Variables of the SEM model

模型	潜变量	测量变量	变量编码说明
测量模型1	个人特征因素	性别	女=1; 男=2
		年龄	20岁以下=1; 21~25岁=2; 26~30岁=3; 31~35岁=4; 36~40岁=5; 40岁以上=6
		家庭生命周期	未婚=1; 已婚、离异及丧偶=2; 育有未上学子女=3; 育有已上学子女=4
		来本城市时间	3年以下=1; 3~4年=2; 4~5年=3; 5年以上=4
测量模型2	社会经济因素	移民类别	劳力型移民=1; 智力型移民=2; 投资型移民=3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及中专=3; 大专=4; 本科及以上=5
		职业	劳动密集型职业(保安、保洁、服务员、营业员、理发师、厨师、司机及其他)=1; 一般职员=2; 专业技术人员(技术人员、教室、文秘、财务、医务人员、律师)=3; 管理人员(个体户、一般管理者)=4
		月收入	1000元以下=1; 1001~2000元=2; 2001~3000元=3; 3001~4000元=4; 4000元以上=5
		工作稳定性	经常变动=1; 偶尔变动=2; 较少变动=3; 稳定=4
测量模型3	制度因素	城市差异	按照2010年GDP升序排列, 郑州=1; 东莞=2; 沈阳=3; 成都=4; 杭州=5; 广州=6
		户籍	非本市户籍=1; 本市户籍=2
		社保指数	拥有五险一金一项记1分, 社保指数为六项得分总和, 得分范围0~6
测量模型4	住房因素	住房类型	其他=0; 单位宿舍或借住=1; 租房=2; 自购房=3
		人均住房面积	10m ² 以下=1; 11~20m ² =2; 21~30m ² =3; 31~40m ² =4; 40m ² 以上=5
		设施指数	计算各样本22项住房设施总得分, 10分以下=1; 11~20分=2; 21~30分=3; 31~40分=4
测量模型5	地方认同	定居意愿	不确定=0; 非常不愿意=1; 不愿意=2; 一般=3; 愿意=4; 非常愿意=5
		购房意愿	其他=0; 不愿意=1; 愿意但能力有限=2; 愿意=3
		子女预期	不确定=0; 非常不愿意=1; 不愿意=2; 一般=3; 愿意=4; 非常愿意=5

异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以个人特征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住房因素、地方认同5个潜变量为基础,并假设前4个潜变量对地方认同产生直接影响,构建假设模型(图2)。考虑在房价日益飙升的现实背景下,住房可能对其地方认同有较大影响,将住房因素作为一个主要潜变量纳入假设模型。

3.2.2 参数估计、模型修正及模型拟合

利用AMOS 17.0软件对假设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假设的结构模型中由个人特征指向地方认同的路径系数,以及个人特征指向年龄的标准化因子负荷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性要求,需对模型进行修正。

修正后的结构模型如图3所示,其中个人特征因素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为间接影响,通过对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来间接实现,同时保留原测量模型不变。对修正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发现无论是结构模型,还是5个测量模型,其参数估计均达到显著性要求(表5)。同时,在模型拟合指数方面,自由度为120,表明模型可以识别,卡方值为1890.3。需要说明的是,已有研究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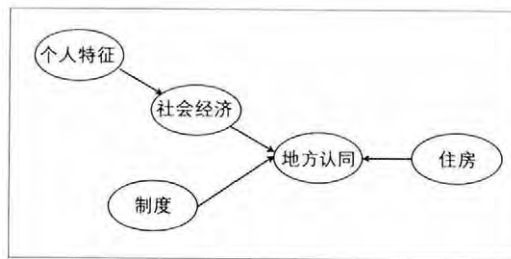


图3 修正模型构建

Fig.3 Revision of the SEM model

出该指数受样本数量和模型复杂性的影响太大,对其关注度正逐渐降低^[31],故本研究主要采用绝对拟合指数RMSEA、相对拟合指数NFI和CFI进行模型拟合评价^[32],其中RMSEA= 0.0683, NFI= 0.8213, CFI= 0.8299,表明模型整体拟合良好,结果可以接受。

3.2.3 模型解释

由上述分析可知,整体模型拟合度良好,结构模型中的各路径系数及测量模型中各标准化因子负荷系数均有意义。具体而言,标准化因子负荷系数反映各观测变量与其所对应的潜变量

表5 模型参数估计

Tab.5 Estimation of the variables in the SEM model

模型	路径名称			假设模型参数估计					修正模型参数估计				
				未标准化参数	S.E.	t	P	标准化参数	未标准化系数	S.E.	t	P	标准化系数
结构模型	地方认同	<--- 个人特征		0.025	0.018	1.440	0.150	0.030	0.103	0.014	7.415	***	0.179
		<--- 社会经济		0.135	0.033	4.125	***	0.100	0.129	0.033	3.904	***	0.094
		<--- 制度		0.229	0.037	6.137	***	0.190	0.237	0.037	6.339	***	0.199
		<--- 住房		0.322	0.070	4.585	***	0.141	0.323	0.070	4.610	***	0.143
模型1	年龄	<---	个人特征	1.000	-	-	-	0.895	1.000	-	-	-	0.938
	性别	<---		0.021	0.008	2.657	0.008	0.051	0.026	0.008	3.460	***	0.065
	家庭生命周期	<---		0.838	0.040	20.880	***	0.812	0.762	0.035	21.573	***	0.774
	来本城市时间	<---		0.308	0.020	15.293	***	0.321	0.285	0.019	14.643	***	0.311
模型2	月收入	<---	社会经济	1.000	-	-	-	0.638	1.000	-	-	-	0.622
	教育水平	<---		0.688	0.040	17.173	***	0.437	0.612	0.039	15.762	***	0.379
	职业	<---		0.620	0.037	16.864	***	0.426	0.617	0.037	16.876	***	0.414
	工作稳定性	<---		0.249	0.028	8.823	***	0.199	0.273	0.029	9.534	***	0.213
	移民类型	<---		0.727	0.037	19.691	***	0.661	0.802	0.041	19.810	***	0.711
模型3	社保指数	<---	制度	1.000	-	-	-	0.485	1.000	-	-	-	0.487
	户籍	<---		0.241	0.037	6.499	***	0.617	0.239	0.036	6.607	***	0.616
	城市差异	<---		0.396	0.059	6.745	***	0.193	0.392	0.058	6.726	***	0.192
模型4	人均住房面积	<---	住房	1.000	-	-	-	0.379	1.000	-	-	-	0.380
	设施指数	<---		0.917	0.102	9.021	***	0.531	0.915	0.101	9.030	***	0.531
	住房类型	<---		0.854	0.095	9.023	***	0.530	0.852	0.094	9.037	***	0.530
模型5	定居意愿	<---	地方认同	1.000	-	-	-	0.886	1.000	-	-	-	0.878
	购房意愿	<---		0.459	0.033	14.049	***	0.492	0.466	0.033	14.229	***	0.495
	子女预期	<---		0.587	0.043	13.545	***	0.423	0.598	0.044	13.734	***	0.427

注:***表示0.001(双尾)的水平上显著。

之间的关系。如图4所示,在个人特征因素的测量模型中,年龄和家庭生命周期两个变量对个人特征的反映程度最好,其系数分别达到0.9380和0.7743;在社会经济因素的测量模型中,月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工作稳定性、移民类别对社会经济因素的反映情况均达到了显著性要求,其中月收入和移民类别两个变量的解释能力最好,尤其是移民类别成为社会经济因素最突出的反映,其标准化因子负荷系数达到了0.7109;在制度因素测量模型中,户籍成为制度因素最突出的反映,社保指数其次,而城市差异这一变量对制度因素的反映水平最低,其标准化因子负荷系数仅为0.1921;在住房因素测量模型中,住房的设施指数和住房类型的解释程度较好,其标准化因素负荷系数分别为0.5305和0.5299;在地方认同测量模型中,定居意愿和购房意愿的解释程度较好,其中定居意愿的反映水平最高,达到0.8777。年龄、家庭生命周期、移民类别、月收入、户籍、社保指数、住房设施指数、住房类型等因素对个人特征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住房因素4个潜变量的反映能力较强,由这

些因素反映的4个潜变量进而对地方认同构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个人特征指向社会经济、社会经济指向地方认同、制度指向地方认同、住房指向地方认同,4条路径的路径系数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但是其路径系数值大小各异,表明各路径系数代表的关系程度有差异。通过路径图和路径系数值来分析各潜变量对地方认同的影响类型以及影响程度。影响(或效应)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24],地方认同的路径图中,实线代表直接影响,虚线代表间接影响(图5)。从影响类型来看,制度因素、住房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对地方认同具有直接影响,而个人特征因素通过影响社会经济因素进而对地方认同产生了间接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制度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大,住房因素其次,社会经济因素和个人特征因素的影响则较小。例如:制度因素变化一个单位,地方认同相应地变化0.1990个单位,住房因素变化一个单位,地方认同则变化0.1430个单位,而社会经济因素和个人特征因素变化一个单位,地方认同仅相应地变化0.0939和0.0168个单位。因此,制度因素、住房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个人特征因素对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虽然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制度因素仍是影响地方认同最重要的因素,住房也已成为地方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4 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已经成为一个日趋分化的复合群体,劳力型、智力型和投资型3类新移民在个人特征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住房因素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而其地方认同状况也不甚相同,从定居意愿和购房意愿来看,智力型移民的地方认同最高,投资型移民其次,劳力型移民最低,而从子女预期来看,投资型移民最愿意让子女在当前城市发展,这种意愿高于劳力型移民和智力型移民。因此,建议未来针对新移民的城市融合问题采取差异化策略,因势利导。

通过对测量模型的参数估计进行分析,发现年龄、家庭生命周期、移民类别、月收入、户籍、社保指数、住房设施指数、住房类型等因素对个人特征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住房因素4个潜变量的反映能力较强,由这些因素反映的4个潜变量对地方认同构成直接或间接影响。影响因素的多样化决定了新移民群体地方认同与融合机制的复杂性,因而在政策应对上不能大而化之,应以深入科学的实证支撑为基础。此外,制度因素、住房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对地方认同具有直接影响,而个人特征因素通过影响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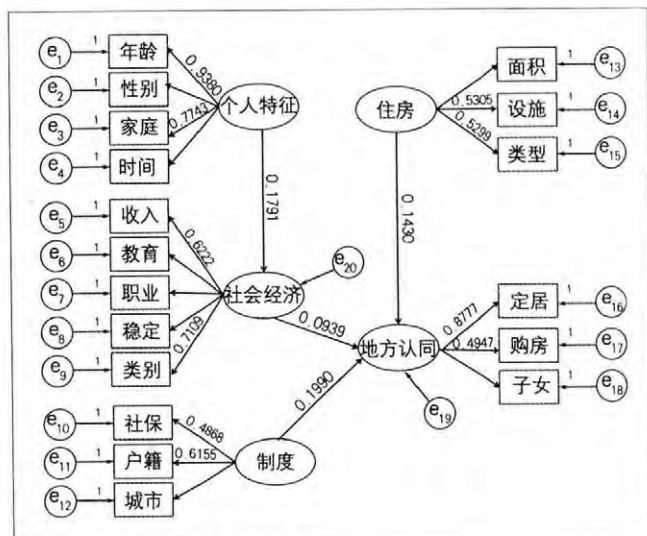


图4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示意
Fig.4 Results of the SEM mo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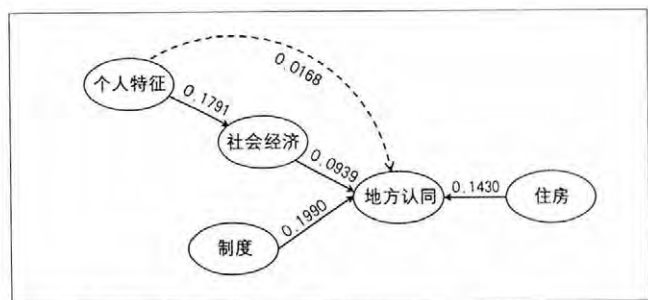


图5 地方认同路径
Fig.5 Route of place identity of new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会经济因素进而对地方认同产生了间接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制度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大,住房因素其次,社会经济因素和个人特征因素的影响则较小。历经多年市场化改革,制度因素仍是影响地方认同的重要因素;同时,住房状况已成为新移民地方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在政府推动新移民城市融合的政策设计中,应重点关注户籍制度改革与新移民住房改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张建丽,李雪铭,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3):82-88.
- 2 马德峰,李凤啸.近十年来我国城市新移民问题研究述评[J].学术界,2010(11):220-227.
- 3 熊远来,陈微.农民工自我重塑与城市适应[J].兰州学刊,2009(9):92-95.
- 4 Tajfel H.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82, 33: 1-39.
- 5 Laurence R, Berry J.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Roman Empir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6 Proshansky H M. 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78,10(2): 147-169.
- 7 Passi A. Bounded Spaces in the Mobile World: Deconstructing "Regional Identity"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2002,93(2): 137-148.
- 8 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方程[J].社会学研究,2009(4): 61-86.
- 9 周敏,林闽钢.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J].社会学研究,2004(3): 36-46.
- 10 Brown R.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ast Achievements,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0, 30: 745-778.
- 11 亨廷顿·塞缪尔.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 12 童星,马西恒.“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J].社会科学研究,2008(1): 77-83.
- 13 许传新.“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J].南方人口,2007,22(4):52-59.
- 14 陈文哲.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8.
- 15 朱力.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3): 30-35.
- 16 张翼.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0.
- 17 余建辉,张文忠.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群体空间自相关分析[J].地理研究,2010,29(5):820-829.
- 18 李志刚.中国大都市新移民的住房模式与影响机制[J].地理学报,2012,67(2): 189-200.
- 19 毛丰付.城市流动人口居住状况与定居意愿调查研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6:90-95.
- 20 Fleury-Bahi, Félonneau, Marchand. Processes of Place Identification and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8, 40(5): 669-682.
- 21 李志刚.中国城市“新移民”聚居区居住满意度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J].城市规划,2011,35(12): 75-82.
- 22 武文杰,刘志林,张文忠.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北京居住用地价格影响因素评价[J].地理学报,2010,65(6): 676-684.
- 23 陶玉国,赵会勇,李永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市旅游形象影响因素测评[J].人文地理,2010,25(6):125-130.
- 24 曹小曙,林强.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广州城市社区居民出行行为[J].地理学报,2011,66(2):167-177.
- 25 Wang D,Chai Y.The Job-housing Relationship and Commuting in Beijing, China: The legacy of Danwei[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2009,17(1):30-38.
- 26 邱皓政.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 27 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 28 杜晓新.从结构方程模型看教育与心理统计学的新发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6(22): 58-62.
- 29 易丹辉.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30 Wang Y P, Wang Y, Wu J. Housing Migrant Workers in Rapidly Urbanizing Regions: a Study of the Chinese Model in Shenzhen[J]. Housing Studies, 2010,25(1):83-100.
- 31 刘军,富萍萍.结构方程模型应用陷阱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27(2): 268-272.
- 32 Bentler P M, Dudgeon P.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Statistical Practice, Theory and Directions[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6, 47: 563-592.